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1.031

# 论《时间中的孩子》的景观书写<sup>①</sup>

李菊花<sup>1,2</sup>

(1.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2.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时间中的孩子》是英国当代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的一部重要作品,故事的背景设置在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伦敦,是一部英格兰“状况小说”。从文化地理学视角考察小说中的伦敦及其周边各郡中的各种景观,这些景观为读者上演了一出“乌托邦”变形记,既揭示了撒切尔政府统治下的英国社会特征和人民生活现状,又反映了作家尝试运用乌托邦想象的威力构建一个和谐共存空间的愿景。

**关键词:**《时间中的孩子》;伊恩·麦克尤恩;乌托邦;景观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15)01-0164-06

## Reading the Spectacles in *The Child in Time*

LI Ju-hua<sup>1,2</sup>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Child in Time* is one of British novelist Ian McEwan's important works. It is set ten years on from the novelist's time of writing in London, which belongs to the tradi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England" novel. The paper rea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eographical criticism to explore the spectacles of London and the Home Counties. It argues that McEwan presents readers variants of utopia not only to reveal characteristics of Thatcherite society and living condition, but also envisage the pos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living space with nature.

**Key words:** *The Child in Time*; Ian McEwan; utopia; spectacles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批评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针对英国工业革命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曾以“英国状况”一词予以概括。随着社会问题的纵深发展,紧随其后的许多富有责任的作家如迪斯累里、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福斯特等均曾在作品中积极讨论社会现状及其解决方案。这类“英国状况”小说创作传统一直传承至今,在英国许多当代作家的作品中可寻其踪。伊恩·麦克尤恩的《时间中的孩子》(*The Child in Time*)就是这么“一部英格兰状况小说”,“故事的背景既不像《水泥花园》一样设置于都市某处不知名的荒地,也不是发生在某些不置可否的地方,而是在伦敦及其周围各郡,地点十分清楚明确”<sup>[1]89-90</sup>,“它反映了麦克尤恩对撒切尔统治下的英格兰的不满。(在伦敦)持有执照的乞丐成群结队,政府打着自由的旗号让贫穷、污秽与富有夹杂在一起。”<sup>[2]51</sup>本·奈兹将该小说视为“一则绿色的寓言故事”,“社会、生态和政治环境是故事的核心主题”<sup>[3]208-209</sup>。德里克·赖特则大胆断言,小说刻画的是一幅千禧年“敌托邦”政治图景<sup>[4]</sup>。本文试继续上述研究者对这部“英国状况”小说的研究,将故事发生地伦敦放置于景观社会这个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认为在麦克尤恩笔下,伦敦是一个后现代

① 收稿日期:2014-04-17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14C0471)

作者简介:李菊花(1978-),女,湖南湘潭人,讲师,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景观社会的综合体。不但“敌托邦”景观抬眼即见,而且也不乏“迪士尼乐园”式的“私托邦”和商品化的乌托邦景观,除此之外,作品还呈现了一个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乌托邦式的希望空间,反映了作家尝试运用乌托邦想象的威力来构建一个和谐共存空间的愿景。

## 1 敌托邦景观

主人公斯蒂芬是一位儿童小说家,他的第一部处女作《柠檬汽水》阴差阳错地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儿童读物之一,并因缘际会认识了出版商查尔斯·达克,后者后来成为政府的一名部长。在查尔斯的推荐下,斯蒂芬进入白厅的官方育儿委员会供职。故事开篇以斯蒂芬在五月末的一个上午他从公寓去白厅上班为视角展开,基本处于瘫痪状态的伦敦公共交通是他眼遇的一道晨景:

各种交通设施一到每天两次的高峰时间就完全瘫痪,以至于斯蒂芬发现,从他的公寓到白厅,乘计程车还不如走路来得快……身旁停着两三列被困得死死的车辆,车身颤动不已,每辆车上都孤独地坐着一名司机……斯蒂芬快步穿过人群,穿过一波波车内收音机播出的连篇废话:广告歌,高能早餐音乐节目,简明新闻,路况通报。不看报的司机便呆头呆脑地听着广播。<sup>[5]1-2①</sup>

“汽车”与“现代媒介”是这幕都市晨景的两大特色,是人的物化和物质主义至上的写照。“困得死死的”“孤独”与“发烫的锡铁车顶”反映了伦敦都市人的日常生活,传神地表达出都市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孤独以及人的物化。汽车作为一项现代空间技术,记录着现代都市景观压迫人的空间体验,传达了异质化的都市景观与人的生命本真存在之间的紧张冲突关系。都市人的身体已被规训、改造为机器的延伸,身体处于物质和技术的包围之中,逐渐被物化了。在现代景观社会,影像决定并取代了现实,物的虚像成为真实的存在。生活在拟像物中的人们,只能通过形形色色的工具和媒介来把握这个社会。小说中不但有“呆头呆脑地听广播”的司机,还有众多跟斯蒂芬一样的电视节目瘾君子“目光呆滞、耐心地”看电视以及“随时准备按要求鼓掌、欢呼”的现场观众。在麦氏笔下,现代人就像一群傻瓜或玩偶,被物质技术玩弄于掌心。不止于此,核威胁、战争的乌云以及大洪水灾难也让人们惶恐不安,世界末日随时成为可能。

依据《希伯来圣经·创世纪》记载,上帝为了惩罚世人发动了一场大洪水灾难,四十昼夜连降大雨。洪水淹没了最高的山,在陆地上的生物全部死亡,只有诺亚一家人与方舟内的生命得以存活。在《时间中的孩子》中,这幅“末世”图景也钻到了作家的笔尖下,粉墨登场:

令人宽慰的理论一点也不少——冰河时代的入侵,冰帽的融化,碳氟化合物破坏了臭氧层,太阳正处于它的死亡动荡时期。从无人知晓的城市营地,来了一批提着大功率水泵的士兵。电视上播放着一架军用直升飞机把一个困在树上的小男孩解救出来,新闻报道中,警察局长或部队指挥官们都拿着小棍在地图上指指点点……就这样,天天下雨,总共下了50天。<sup>[5]181-182</sup>

这幅现实版的“世界末日”图在小说中看似无心之笔,因为“雨停之后,大家又恢复了正常生活”,但气候和生存环境灾难的降临、核武器的当下威胁以及奥运会第二天“全世界面临毁灭的威胁”等交织在一起,表明“世界末日”正以一种新的形式进入大众的生活和意识中。引文中“士兵”和“军用直升飞机”的出现则提醒读者战争并不是过去时,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政治和战争一直是20世纪进程的主角,资本主义试图通过一次次的“地理重组”(既有扩张又有强化)来部分地解决自身危机和困境<sup>[6]53</sup>。在此,麦克尤恩试图告诉读者,战争与极权政治一样只会将世界带入不断被摧毁并重塑的恶性循环,最终湮灭在全人类共亡的漩涡中。

此外,小说对“广场”与斯蒂芬工作的“白厅”着墨颇多,通过对广场附近的乞丐和白厅里各色“官方育儿专家”等景观的观赏,清晰地表达出作家对伦敦这个异化的、扭曲的极权空间的忧虑。极权主义社

① 本文有关小说的引文均出自:麦克尤恩著、何楚译《时间中的孩子》,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有的地方作者略有改动。

会政治意识形态通常藏在社会的背后,体现为高度干涉主义,政府往往被以秘密警察和武装部队为骨干的极权政党所控制。在现代社会它往往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实现对大众的操纵控制,阻止大众参与政治或愚弄大众。查尔斯没有政治信仰却平步青云,成为了一名年轻的部长。他鼓吹“穷人要自立,富人需多鼓励”,在为《泰晤士报》写的一篇文章里,他对凭证乞讨施行两年的情况进行了回顾:

通过去除法制不健全时候的渣滓,同时为了建立一个更精简、更适当的公共慈善机构,政府为它自己树立了一个微观理想,它的经济政策也为此服务。上千万的社会保障资金节省下来了,众多男人、女人和孩子又回到我国商界长期以来熟悉的自给自足状态,体验随之而来的苦乐酸甜。<sup>[5]36</sup>

查尔斯认为这是一个各方都受益的佳策。政府得以开源节流,乞者有法可依,凭证乞讨,自足自乐。然而在麦克尤恩看来,乞丐佩带的“闪亮的徽章”与他们乞讨的气势是运作不良的政府的策略——“割断公共政策和个人情感之间的关系,抹杀人们辨认是非的直觉”<sup>[5]9</sup>。凭证乞讨现象是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个微缩点。它被指责为“劫贫济富”,穷人的福利被降低,许多私人机构涌现出来。因此,小说中呈现广场附近的乞讨景观旨在影射英国撒切尔政府政治上的某些“无能”,除此之外,麦氏还精心设计了白厅内的“官方育儿委员会”,矛头直指向政治腐败和集权政治体制。这是一个由14个小组委员会组成的机构,其真正的职能“是满足无数利益集团各不相同的要求”。各位委员之间关系十分冷漠,对他人的观点都嗤之以鼻,麦氏在小说每一章的前面引用该委员会编写的《官方育儿手册》中的一段话,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手册》的中心思想就是成人和作为其象征的社会对孩子的规训<sup>[7]</sup>,《手册》是政府管理、监控公众的写照。政府的一系列保守主义政策如支持强者、宣扬自我利益、卖掉学校,甚至在《手册》丑闻曝光后,通过大众媒介进行党派之争,愚弄大众。因此,查尔斯和“官方育儿委员会”是英国社会极权政治的代表,是“敌托邦”(dystopia)社会的典型呈现。

敌托邦是一种因为恶性竞争、权术与诸多严酷制度而造成的一个令人绝望的假想社会,意味着对乌托邦的颠覆。正如上所述,《时间中的孩子》将故事发生时间设定在10年后的英国伦敦,在这个20世纪末的西方大都市中,人类沦为物质技术和幻像的奴隶,世界末日恐慌萦绕,政治腐败与极权主义并行。这些物化、末世和极权地理景观是20世纪乌托邦构想进入现实社会实践之后,其“在场化”带来的触目惊心的恶果,正如荷尔德林所言,把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恰恰是人们将其变成天堂的企图<sup>[8]</sup>,在小说中,读者不仅要反思这种“敌托邦”城市图景,也要警惕另一类“乌托邦”景观。

## 2 “人造的”乌托邦景观

迪斯尼乐园是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商业标本。这是一个快乐、和谐且无冲突的乌托邦,游离于“真实的”世界“之外”,既能培养对某种过去的怀旧情怀,又能使商品拜物教文化永久化<sup>[9]164</sup>。大型购物中心(包括超市)和那些为富人开发的“绿地”则是迪斯尼乐园地方化和普遍化的结果。小说中斯蒂芬家附近的大型超市和查尔斯后来隐居的处所就属于这类景观。

查尔斯·达克由于童年的创伤,对从政赋烦了之后辞掉政府部门职务,接受妻子特尔玛的建议卖掉伦敦市中心的公寓,搬去位于沙福克附近的一座庄园,这是一处封闭而专权的富人住所。隐蔽、特权和颇有英国古老庄园气息是查尔斯住所给人的印象,这类上层社会的住所景观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就是排他、专权和怀旧。大面积的草坪、矮树林和灌木丛将查尔斯的宅院与周围隔离,并从人们的视线中隐藏起来,房子的唯一性则更加强了某种专权的象征。如果我们回顾英国庄园经济的发展史,就会发现这种隔离和特权正是近代英国社会庄园景观形成的必备条件。威廉姆斯在1995年出版的《文明景观:花园与18世纪英格兰社会》一书中曾借用诗人赫德(Hurd)诗作里对一处贵族宅第的描写来说明这类景观的封闭和隔绝:“马路都设了关卡,靠东的一条通往寓所,它非常宽阔,浓阴覆盖,看不见进出兰德的人。”<sup>[10]106</sup>查尔斯的郊区别墅无论从设计风格还是地理位置来看都可视为现代版的贵族庄园,与贵族宅邸一样均根植于特权政治,验证了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所说的,“一个内部团结的上层社会的远见主要表现在对其财产拥有绝对的所有权。”<sup>[11]46</sup>财富和权力的悬殊加速形成了长期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大

都会世界,随着都市中心财富积累的增加,出于怀旧和特权等乌托邦理想,财富又逐渐发生转移,不是向排斥穷人、下层人和边缘人的城市远郊转移,就是把自己封闭在高墙后,在郊区的“私托邦”(privatopia)和城市的“门控社区”内<sup>[6]145</sup>。这些“私托邦”景观建立在财富和等级制度之上,秩序的维护又通过地理的划分和不平衡发展得以实现。

除开上面这类封闭在高墙内的“私托邦”,小说中还有一类以超市为代表的都市景观,这类景观往往模糊地理上的不平衡,力图塑造一个“平等的”乌托邦商品世界。在小说开篇,斯蒂芬带女儿上附近超市采购物品的场景,超市里各类商品琳琅满目,各色人等汇聚,离开时每个人都收获满满、心满意得。超市的迷人之处在于,这是个理性、有序的空间,漫步于其中的人感到安全且可以享受自由选择和支配金钱的欲望。在鲍德里亚看来,超市就是一个产品的超度空间(Hyperspace)<sup>[12]153</sup>,是商品化的地理景观的大众代表。它是消费文化和全球资本流动的象征物,也是商品、消费与后现代景观社会的结合体,潜移默化中重新建构了都市人的日常生活。超市也是现代全景规训社会的凝结物,它既能满足人们凝视的欲望,又装配有洞察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监视手段,实现了对人的真实统治。正如福柯所言,“全景敞视建筑是一个神奇的机器……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sup>[13]227</sup>商品在这个景观空间中占据统治地位,而倘佯在商品中的人,眼到之处皆为商品,连人也不例外。斯蒂芬太过于专注在“物品”选购上,以至于将一直跟踪他和女儿的拐骗犯也想象为商品:

他身边那些不确定的形状都飘走了,分解了,无法辨认……他站直了身子,也许这时他也曾意识到凯特身后站着一个穿黑色大衣的人。但这几乎不能算是一种意识,而只是在无望的回忆中产生的最脆弱的怀疑。那件大衣可能是件女装,或者是只购物袋,甚至可能纯粹是他的想象。<sup>[5]12</sup>

“黑色的大衣”“女装”和“购物袋”等字眼都表明斯蒂芬抬眼所望之处皆为商品,商品是他进入超市后盘踞在意识中的唯一存在物,以至于忘记了女儿的存在。可见商品不但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方面,而且还侵蚀了人的意识,进入主体性之中。身处其中的人眼到之处除了由科技幻想、商品文化和无止境的基本积累纠合在一起所提供的东西之外,“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别无选择”这句话正是撒切尔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常用说教词。这种新自由主义“给我们提供股票市场价值指数而不是人道主义,提供全球性苦难而不是尊严,提供空虚而不是希望,提供国际恐怖而不是生活”<sup>[6]70</sup>。麦克尤恩对撒切尔、里根鼓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一直都持反对态度,他曾在1983年公开承认,“撒切尔夫人统治下的英格兰令我厌恶。”在电影剧本《农人的午餐》(The Ploughman's Lunch, 1984)里,他也表达了反对撒切尔政府的声音<sup>[14]187</sup>。在此,他精心设计了斯蒂芬女儿凯特在超市被拐走的一幕,影射此种人造的乌托邦看似稳定、不变,实则是一趟无刹车的灾难列车,随时都有可能失控。

“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含着某种意义。”<sup>[15]154</sup>超市和郊区富人庄园的涌现提供了一种新的空间游戏,新都市生活提供了让人怀旧和幻想的空间,在其中人们尝试恢复历史、传统、集体记忆与相伴而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恰尔兹教授指出,“《时间中的孩子》最打动人心的一点就是故事设定在十年后的英国,似乎暗示英国社会发展的可能‘前景’。”<sup>[16]60</sup>这一“前景”的代表人物就是凯特和查尔斯。乞丐女孩的死亡和曾经温馨无比的家的迅速破败暗示了凯特的死亡,更是对英国未来“前景”的预测。同样查尔斯扭曲的悲剧人生也清晰地表达出作家对当时英国政府的不满和伦敦乃至英国这个异化、扭曲的敌托邦、私托邦及商品化乌托邦空间的忧虑。但麦氏并没有就此收笔,他认为“在这个选择性的城市现实中,我们的重点应该是修复而不是失去”<sup>[17]42</sup>,这也是作家80年代后创作风格改变的一个突出特点。但修复并不意味着抛弃乌托邦,因为没有乌托邦的理想,就没有办法确定我们前进的方向。

### 3 希望的空间

20世纪80年代是英国当代文坛剧变的时代,包括麦克尤恩在内的许多作家通过小说创作反思当下的历史事件,参与社会政治事务,实现了从对内心世界的关注转向对现实事件的思考。在研究者瑞安看来,“70年代的麦克尤恩以迷恋堕落、怪异和恐怖事物的作家形象步入文坛”,他写作风格的巨大转变

是参与“女性主义和和平运动”<sup>[18]203-218</sup>。艾伦·麦西也表示,《时间中的孩子》包含着“人性和感受的能力”,这是作家的前两部作品中所缺乏的<sup>[2]51</sup>。麦氏通过描写对爱、人性和生命的重视展示了他温情脉脉的一面和积极入世的情怀。

《时间中的孩子》是一部“英国状况”小说,因为“小说描绘的世界就是一幅撒切尔执政下的英国‘故托邦’图景”<sup>[1]97</sup>,斯蒂芬是英国社会现状的代表。他屈服于物质利益同意将他的《柠檬汽水》作为儿童读物出版,进入官方育儿委员会后每周发表违心言论。女儿凯特的被拐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因为在这之后,曾经隐蔽的身份性别问题凸现了出来。恰尔兹教授在总结学者玛茜和琼斯等人的观点后认为,《时间中的孩子》这部小说就是一个男性叙事文本<sup>[16]62</sup>。全书大部分篇章都是通过斯蒂芬的男性视角来进行观看,钢铁、玻璃以及水泥等建造的交通系统、超市、广场、白厅等地理空间无一不是成人男性领域和权威的延伸,斯蒂芬的“家”也是一个典型的男性霸权场所。有意思的是,小说中的首相毫无疑问是撒切尔夫人,但也被故意模糊性别指称,一个极权的“刚性”的集权统治者形象出现在读者眼前。因此,斯蒂芬代表的是一个退化、堕落、毫无生气、垂死挣扎的男性统治社会。但可喜的是,他后来重拾信任 and 爱,逐步迈向善良、勇敢,积极面对现实并敢于承担责任;与此同时他逐步抛弃男性霸权话语,开始理解、认同和赞赏女性气质,并在几近原始的状态下帮助孩子的出世,与妻子共同迈向希望的空间。

乡村景观之旅是斯蒂芬发生转变的空间移动之旅。他与妻子朱莉卖掉共同的公寓后,朱莉买了位于肯特郡奥特福德的一处乡村住所。四月的一个阴天,斯蒂芬决定去看望她。映入眼帘的乡村美景给了他久违的熟悉和温暖:

松林突然让位给了无边无际的麦场……这片黄色的田野像沙漠一样,唯一表明它有边界的地方是地平线上的一道线,从那儿林地重新开始延伸。也许这只是一个幻觉……他正穿过一片虚空。一切前行的感觉,也就是一切时间的感觉,都消失了。对面遥远的树并没有变得更近一些。这是一幅痴迷的景象——它的所思所想只有麦子<sup>[5]52</sup>。

这里“松树林”、“麦地”无边无际,无法进行地理分界;在微风的作用下,起伏的麦浪犹如女性妙曼的身姿,这些都与都市里由钢铁、玻璃、水泥建造的男性权力空间截然不同。这是一个展现女性特质的空间,一个人与自然平等共存的空间,斯蒂芬在这里宛如回到母亲的子宫。在这个自由而充满希望的空间,朱莉开始着手转变自己,有意识地重新理解生活和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这个空间也潜移默化地影响、改变斯蒂芬,他好似重生了一次,重新检视人生的各个发展阶段,变得坚强和成熟,并以新的姿态重新开始生活。他奇迹般地救助了被困在倾覆了的卡车里的司机;积雪覆盖的夜晚,他将自己温暖的大衣披在乞丐女孩的身上;他重拾荒废已久的书法,练习诗歌和打球。不止于此,他还交出了话语权,学会倾听。在朱莉分娩前夕,耐心地听着朱莉描述她的心路历程。为了突出斯蒂芬男性话语权的让位,故事最后10多页的文字都是以朱莉的叙说和下指令而斯蒂芬执行指令或两人真诚平等交流为主基调:

“你动作很快”,她轻声道,“上来吧。”

“过来坐下。”“来,坐下来。”

“(助产士的电话)在我大衣的口袋里,挂在门后。你出去的时候把水壶烧上水。回来后灌两个热水瓶。还有一壶茉莉茶。两堆火都要烧得再旺一点。”

他正准备跟她争辩,突然想起了急噪易怒也许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是这段路程的一个标记……他递给她茶,又主动提出帮她按摩一下……他说话时拿出了足球教练那样温和的语气<sup>[5]230-237</sup>。

朱莉通过使用祈使句和简单但指令性强的句子建构了她个人化的叙述声音,成为一连串的权威之音,其中也糅合了一个没有特权地位的男性的叙事话语。这种叙述方式不仅解构了性别地理空间建构中的不平衡地位,强调男女作为“自然力量”的平等参与,还赞扬了母性对生命的热爱、保护和敬畏。斯蒂芬的母亲当初未婚先孕,她选择坚定地留下孩子,勇敢面对生活,因为“这个婴儿是活生生的,是一个独立个体,她必须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他。他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砝码”<sup>[5]189</sup>。较早研究麦氏作品的学者斯莱对克莱尔和朱莉这样的女性十分赞赏:“因为破坏性等级秩序在当代社

会的存在,无论是在各个社会还是在各种关系中,女性经常被认为亦步亦趋,柔弱服从。麦克尤恩挑战了这些偏见,通过他的小说探讨了男性和女性重新审视、重新评价其模式化角色(已被社会预先确定)的种种方法。麦克尤恩的女性人物常常突破这些社会障碍,成为联盟中的强者。”<sup>[19]</sup><sup>16</sup>

通过《时间中的孩子》这部小说,麦克尤恩似乎意在凸显性别平等和爱、信任、责任及对生命的敬畏是对抗敌托邦和商品化乌托邦的最好途径。相反,逃避和封闭自我,甚至像查尔斯一样试图让自己回到母体子宫状态的行为并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麦克尤恩十分看重个体的闪光点,虽然他并不认为当今社会比从前光明了,但他坚持认为“人们总是比他们所生活下的制度要好”<sup>[20]</sup>。在故事结尾,斯蒂芬和朱莉共同迎接孩子的顺利降临,而且孩子的性别模糊不明,这传达出作家意在建构一种抹除性别差异、与自然休戚与共的新型乌托邦理想。

#### 4 结语

《时间中的孩子》被公认为是麦克尤恩的成熟转型之作,虽然小说中仍然不乏由于异常和突变事故给人所造成的创伤和恐惧,但更多关注的是广阔的社会与政治问题,思索这些问题怎样影响和制约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在小说中,现代人的生活空间实际上是一幅包含生活、爱和历史的复杂的立体地图:都市是一个被物化的、充斥极权的末世“敌托邦”之所,是一个或被商品所缚或被封闭在高墙门控内的“乌托邦”空间。那么人类的未来在那里呢?麦克尤恩给出的答案是——“在人类自己的重塑上”。在作者看来,由地理不平衡而造成的特权、封闭和男性霸权应该被自然意义上的地理平等、性别平等所取代,热爱生命,敢于创造,带着爱重返世界。麦克尤恩并不是一位政治改革家,而是一位作家,但是他通过创作来体察社会的变奏,反思当下的政治、历史事件,思索个体在社会和历史洪流中的角色,展现了他宽厚的人性观照,无愧于“国民作家”之誉。

#### 参考文献:

- [1] Malcolm D. Understanding Ian McEwan[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2002.
- [2] Massie A. The Novel Today: A Critical Guide to the British Novel 1970 - 1989[M]. London: Longman, 1990.
- [3] Knights B. Writing Masculinities: Male Narratives in Twentieth - century Fiction[M]. London: Macmillan, 1999.
- [4] Wright D. New Physics, Old Metaphysics: Quantum and Quotidian in Ian McEwan's The Child in Time[J]. Revista Alicantina de Estudios Ingleses, 1996(9): 221 - 233.
- [5] 麦克尤恩. 时间中的孩子[M]. 何楚,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2.
- [6] 哈维. 希望的空间[M]. 胡大平,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7] 程心. “时间中的孩子”和想象中的童年——兼谈伊恩·麦克尤恩的转型[J]. 当代外国文学, 2008(2): 87 - 95.
- [8] 王一平. 论反乌托邦文学的几个重大主题[J]. 求索, 2012(1): 201 - 203.
- [9] Marin L. Utopics: Spatial Play[M]. London: Humanities Press, 1984.
- [10] Williams T. Polite Landscape: Garden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 - century England[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1] 克朗. 文化地理学[M]. 杨淑华, 宋慧敏,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2] 布希亚. 模仿物与拟像[M]. 洪凌,译.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8.
- [13] 福柯.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 刘北成, 杨远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14] McEwan I. “Interview” in John Haffenden, Novelists in Interview[M]. London: Methuen, 1985.
- [15] Lefebvre H. Trans. Donald Nicholson - Smit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
- [16] Childs P. The Fiction of Ian McEwan[M]. New York: PalgraveMacmillan, 2006.
- [17] Wells L. Ian McEwan[M]. New York: PalgraveMacmillan, 2010.
- [18] Ryan K. Sex, violence and complicity. Martin Amis and Ian McEwan[C]// in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Fiction, Cambridge: Polity, 1999.
- [19] Slay J. Ian McEwan[M].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6.
- [20] Muchnick L. You Must Dismember This[J]. Village Voice, 1990(28): 102.